

A GREAT BOOK
WITHOUT WOR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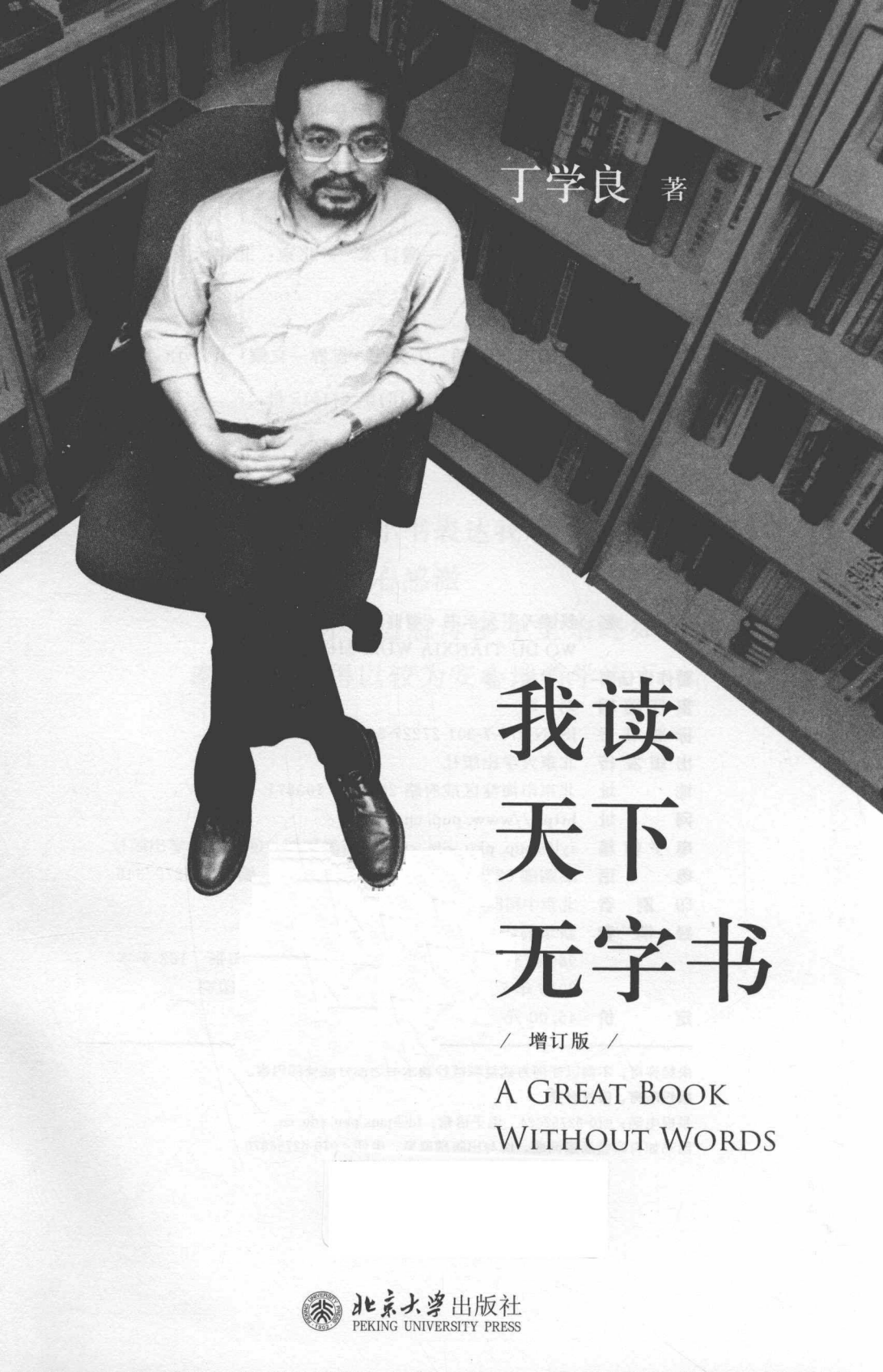
我读 天下 无字书

/ 增订版 /

丁学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丁学良 著

我读 天下 无字书

/ 增订版 /

A GREAT BOOK
WITHOUT WORD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读天下无字书/丁学良著. —增订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301-27227-5

I. ①我… II. ①丁… III. ①文化—世界—文集 IV. ①G1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4615 号

- 书 名 我读天下无字书(增订版)
WO DU TIANXIA WUZI SHU
- 著作责任者 丁学良 著
- 责任编辑 刘 军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227-5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6
-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17.25 印张 163 千字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献 辞

谨以这本小书表达我对小弟、小妹及其配偶们的衷心感激

他们对身边慈母多年里始终如一的奉侍,令我得以较为安心地游学天下



永远读不完的书,永远行不尽的路

增订版序



在这个增订版里，我新加进了两章。一章是回忆台湾“联合报系”的首任董事长王惕吾先生，他退休后被该报系同仁敬称为“创办人”，因为这份在海外华人世界多个城市均设有分局或经营点的中文大报及其附属的报刊和书店，是他于1949—1950年间领导创办的。三十年前靠着王惕吾先生的报系诸位从业者的联络介绍，我才结识了台湾的传媒界、文化界、教育界、政界、商界的更多人士，更在二十七年前实现了我去台湾访问考察的心愿。另一章是回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思想界、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前辈人物之一于光远先生，他是1982年夏季把我商调进北京的两位恩师之一。

这两位在海峡两岸三地和其他华人社区极富声名的长者现已仙逝，纪念和评论他们的文章历年积累下来汗牛充栋。我的文字可能和已经发表过的这类文字在某些方面颇不一致，而我认定，这恰恰是个人回忆录的价值之所在。倘若所有的人对某人的回忆都一模一样，那要么是撰文者们有问题，不按实情叙述，要么是被忆者有问题，他或她从来



不以真面目示人,因为真实的人一定是多层多面、多姿多彩的,越是有成就者越是如此。

我的这类回忆故事和文字以后还会讲述、还会撰写,为的是让读者诸君从我有幸亲身接触过的那些各禀特色的洋人、华人和华洋混血人士的身上,感悟出做人和做事的情、义、理。而且,有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几位资深编辑一如既往的督促,我也不能不继续下去——他们的大名均收录在本书第一版《序言》里。增订的这两章,一篇是我口述,而后由戴志勇整理成文,部分发表于他长期任职的《南方周末》“大参考”栏目里。他与我合作多年,还有几篇极富历史意义的文稿,待到合适的时机,也会扩充润色后编纳入书。另一篇则缘起于《南方周末·名牌》杂志的专栏,原编辑人员的大名也收集于第一版《序言》里。

本书第一版刊印有一帧“献辞”,那时慈母还在世。如今慈母已经离世,我保留原来的“献辞”不作改动,一来是为着纪念慈母,二来是为着持续表达我对那些年里日日奉侍慈母的小弟、小妹及其配偶的感激之情,尤其是在慈母弥留之际和治丧期间所尽的孝道。即便是在注重孔孟传统的皖南,如此这般长年累月的孝悌作为,也是不多见的。我越是思念慈母,就越是感谢他们。

从十几年前在中国内地鼓吹要重视研究中国日增的海外利益,到2013年夏末终于见证在深圳大学成立了此一研究中心,并蒙该校两任校长章必功教授、李清泉教授礼聘我为中心的学术指导,到如今已经颇有时日了。在未来的时

间里,真希望还能够鼓吹推动一两件于国、于民、于人、于己皆有意义的事,比如说,促成中国沿海城市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国外设立一个正规校区(overseas campus)。它和已有的中国在国外设立的众多家“孔子学院”不同,是一间四年制(或三年制——依所在国的高等教育制度而定)的大学本科生学院,正式招生,毕业时对学生颁发所在国教育部门和中国的主办方大学皆承认的正规学士学位。

在哪儿设立这个本科生校区最为合适?依我所见,不应该设在发达国家里,因为那儿的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用不着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再去锦上添花了。我提议这个本科生校区应该建在东南亚地区,因为那里的华人群体加起来,有将近三千万人之多,而除了一两个国家之外,都亟须高等教育的新补充资源。依所在国的政府意愿,这个本科生校区或是由中外两所大学联手合办,也可以是由中国的大学一家独资经办,以英语和所在国语言进行双语教学;若有些课程是集中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艺术的,也可以用汉语教学。它所培养的本科生毕业后,少数可以来中国进一步攻读研究生学位,多数留在本国,主要就职于和中国的经济贸易及文化往来相关的工商行业和非营利机构。若在未来的几年内,能够促成创办这样的一个中国大学的国外本科校区,那对中国的软实力长期投射和中外经济贸易关系,必定会产生可观的推动。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每年动用数百亿美元的巨量投资,倘若以其百分之一二,资助这样的一所国外校区,岂不美哉!



其实,我和我的几位国内外朋友及研究项目伙伴,从1997年前后起,就在设想和讨论这个方案,也相继考察了中国周边的几个国家,看看具体的条件、机会、成本和困难何在。我们初选过的地点包括马来西亚首都的郊区、泰国北部清迈附近、印度尼西亚的中爪哇沿海城市。当初参与这个构思的前辈之一,就是本书第七章的主人公“汪老爷子”汪华林博士。

完稿于深圳大学

“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办公室

2016年元月6日

序 言



这本集子里收录的，是我过去二十多年里读“天下”这本无字大书的一些心得、灵感和体会。本书不是我至今最重要的出版物，因为它对我的饭碗没什么大影响。本书也不是我至今最费心力的出版物，因为它并不涉及理论或概念的修正、构建。但本书却是我至今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投入最深的著述，因为它浸透着我游学天下的三十春秋情怀。

读“天下”这本无字的大书，讲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对我们这样的中国人来说做起来可不容易。首先的一条，是你得被授予行走天下的机会。与很多同时代的国人相比，我算是稍微幸运一点的，在中国闭关锁国数十年之后、一朝推行对外开放新政策的初期，就被允许去了美国念书。求学期间和学成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有缘接触和认识了多位在做学问、做事业和做人方面颇有独到之见和特别之处的西方人士、东方人士、双方人士（混血儿）。他们有的目下正年富力强，有的现在已经仙逝；有的早已是国际上知名的大师，有的是一个领域里面成果殷实的干家。但我对他们的描述评论，均不是从平面入手，以求面面俱到、综合持中（亦



即画领袖“标准像”的那种风格),而是从我与他们接触的那一小点那一小段入手,由“方寸”来看“世界”,就像古人欣赏金石印章、今人欣赏纪念邮票一样。有心的读者在细细品味这些人和他们所做之事、做事的方式方法的过程中,当会时时有会心的一笑或一叹甚或一鞠之泪,悟出些许浅易文字之外的细腻深层道理来。

我在国外选择的研究领域属于“比较政治社会学”和“现代化/发展研究”,因此很看重在现实世界里面同中寻异、异中索同。获得博士学位前后,我利用了多种机会游学列国——北美、西欧、苏联和中欧、东欧、环太平洋国家及地区、靠近北极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等。迄今算来,尚缺乏对非洲大陆、拉丁美洲和南亚次大陆的感性体验,以后还要加倍努力申请经费,逐一考察这些地方。我周游列国,实践的是“行万里路,读两本书,思一件事”的知行哲学。古人有言:“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那个时代,有心人发愤尚能做到,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就难以身体力行了。古时候读书人云游四海多半骑着头小毛驴,一天的行程不过数十华里,万里路行下来,好歹也得十年时光。古时的书籍字大而册薄,一天读它三四卷不成问题(根据我少时在家乡读明清时代木刻石印绣像小说的经验测算得出)。万里路行下来,读万卷书的计划指标也就差不多达到了。而在当今时代,空中航行万里,连两头往返机场的时间算上,也不过两天辰光——能读毕两本书,已属不易矣。“思一件事”,就是条件性地反思:“在这方面/这个问题上中国是怎么样的?”

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所学所行、所食所饮，都会本能地或自觉地拿来与中国的相关事情作个对照比较，发一番有言无言的感慨：“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的？”或“为什么外国在这种事情上不像中国那样？”无言的感慨，多半已掺和着红酒绿茶渗入肝肠。有言的感慨，小部分的收录在这本小书里。

出去游学近三十年来，我从“天下”这本无字的大书中获取的多种多样启迪，其价值并不少于我从英文书籍报刊上经由刻苦阅读所吸取的专业信息。如果要用最简洁的对比说法，不妨把后者称作“知识”，而把前者称为“见识”。“见识”主要得自于亲身经历，它有别于纸上谈兵。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我在回答很多中国学生和家长们的问题——“您怎么看‘远距离上课学习’（distance-learning）和外国大学在华的合作项目特别是合办校区？该不该去上这样的课目拿它们的学位？”——时我总是直言相告：如果你们家有条件的話，还是出国去学习一段时间好，因为“留学”的意义不仅仅是在课堂里读书，还包括在书本和课堂之外的广义学习、体验、取经。从你在国外或海外亲身接触和相处的人身上，你细心观察、琢磨乃至有选择地学习他（她）们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事业、如何做人，是会终身受益的。

读“天下”这本无字的大书，无始亦无终，无边又无际。我虽然多年来行走于东南西北方之间，用大脑读更用心灵读，也只是读了这本无字大书的前十几页——未来的那些篇章还漫长悠远着呢！

我与读者诸君分享自己读“天下”这本无字大书的心

得、灵感、体会，完全不是以板着面孔“哼哼教导”的方式——我家乡的识字农民早年讨厌透了说教型的各级干部，把他们自封自誉的谆谆教导一律改为“哼哼唧唧的教导”，简称“哼哼教导”。我拒绝“哼哼”，特地选择以面对面讲故事的风格来表达。原先我并不具备“本人会讲故事”的自我意识，最早告诉我“丁学良，你很会讲故事”的，是一位于1993—1995年期间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任教、极富语言天赋的女同事。这位出身于香港的华人女士，不但粤语说得正宗，连潮州方言、客家话、普通话、英语，都说得流利顺畅。因为她有语言天赋，所以我们说普通话的一帮人在一起海阔天空摆龙门阵的时候，她也会兴致勃勃地参与。那一天下午我正在香港科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小会议室，对华人同事们讲外号“许和尚”的许世友上将的故事。1966—1968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时任南京大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有一个从前做过他卫士班长的姓丁（与本人无关）的下属，在我家乡安徽省宣城荣任一个农垦师的师长，许司令就把他的两个孩子交付给这位丁师长照顾。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不能泄露许世友是他们爸爸的真实身份，但这两个孩子毕竟出身不凡，言语中偶尔透口风，便差一点儿泄露了天机。“我们家在南京，到我们家来的叔叔都是大胖子。”某一日年纪较小的那个男孩对周围宣城本地的小伙伴们这么说。宣城的孩子一听就傻了眼：那个年头全宣城县县城数万人里面，也就是三五个大胖子，一个是县委书记，一个是县长，另外几个是县委大院食堂里

的炊事员。从南京来的那两个小孩家所有的客人都是大胖子,那还了得!那他们家爸爸肯定比县委书记、县长要大得多!

看官,此处不要小看了我们宣城的那些半大的孩子们,他们虽然没见过大世面,社会学、人类学的直觉敏感度却是足够高的:在那个物资普遍极度匮乏的年代,大胖子就是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形象表征——哈佛大学当年的经济系讲座教授、西方最著名的科学技术史专家之一的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给我们讲授“经济发展”热门大课的首堂开场白就是:“衡量富国穷国的指标系统复杂多样,我们要花费整个半学期的课才能够把它们介绍一遍。不过有一条金科玉律你们倒可以拿着到处试用:穷国人民和富国人民都关心‘吃’的问题,只是穷国人民关心的是怎么才能吃得饱,富国人民关心的是怎么才能吃得不发胖。”

记得1999年春末夏初,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在吉林省延边自治州延吉市开完全国“世界经济学会青年理事会”年会后,亲自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考察。那时他们刚刚才有所谓的“具有朝鲜特色的经济特区”。我们一行人被安排在他们国家已故领导人早年享用的避暑山庄下榻,每天24小时都有特殊部门的便衣警卫礼貌而警觉地陪伴着我们。双方相处稍微熟悉了一点,他们便悄悄地问:“你们都是中国的大领导大干部吧?”我们很诧异他们接待方怎么会有这样的信息——我们其实全都是手无实权的大学教师和研究机构里的青年专家,他们便据实相告:“因为你们都是胖子。”



因为我们在他们城乡参观，到处目击的都是普遍偏瘦的老百姓，“唯二”的胖子就是挂在墙上的那两幅领袖画像。

考察完毕在离开朝鲜回到中国边境的前一刻，我感慨地对身边的两位年轻的老朋友邵主编、冯副主编（当时屈居副职，如今早已经是一家中国出版的英文经济评论杂志的正主编了）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二十年间使我们一步从匮乏社会跨进了中等发展程度的国家，我们的腰围就是铁证。”确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朝鲜人看去他们国家访问的中国人，就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们来到中国访问的西方人：“这些家伙日子过得真好，一个个吃得那么白白胖胖！”

那一天下午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小会议室里，就着冰镇的日本清酒，讲着许世友的孩子和大胖子叔叔们，讲着许司令到宣城来看望他的下属，屁股没坐稳就要去打猎，因为许司令讨厌吃猪圈里喂大的猪、鸡笼里养大的鸡，偏好吃山上奔跑的野猪、林里流窜的山鸡，而且一杆步枪举起来弹不虚发。不知不觉地，一点八公升的特大装日本清酒瓶里所剩无几了，我对许司令的描述也接近尾声，那位平时眼光颇苛刻的女同事最后真诚地对我赞了一句：“丁学良，你很会讲故事！”数年之后我在台湾出了一本当代社会史的小书，以讲故事的方式描述我曾经目击过的三次大革命之细枝末节，我的年纪尚不够老的老同学、著名经济学家大彬在他的美京华盛顿郊区的别墅里，通宵一气读完，两次从床上笑颠滚落地板。

事后想想,我会讲故事的本领多少也有些源头。我从小爱读旧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封神榜》。稍微长大了一点,又爱读《红楼梦》和《东周列国志》。再长大了一点,就酷爱读《史记》。司马迁伟大的讲故事的本领,把他生前两千年的中国历史,讲成了他身后两千年来中国史学家的不朽经典。我虽然不是史学家,却也从太史公那里承接了一点点讲故事的灵气。

但我这点讲故事的本领,若无几位年轻编辑们的鼎力相助,也是成不了篇章的。这其中特别要感谢的,是《南方周末·名牌》杂志的编辑黄惊涛、周筱贇、严晓霖,这三位著名的才子才女在他(她)们当年的顶头上司向熹和李红平的支持下,屡断屡续,前仆后继,把我历年来讲的故事,一篇篇及时整理出来,变作了《名牌》杂志的专栏文章——这个专栏后来被我命名为“愿生汉唐”,以表明我最心仪向往的活着的方式——并赢得了不少读者的喜爱。其中有一篇贴上了前《名牌》杂志领导人之一的博客后不到一个星期,阅读者点击量达到二十四万。我这次编辑成书的过程中所依据的脚本,大多数是经他们三位之手整理过的专栏文章。尤其是江南才女严晓霖精心妙手下烹出的文字,真如同我俩家乡的野生鲜鱼熬的汤,直令人品尝后嫌碗太浅、嫌勺太细!当然,我对所有的篇章都是从头到尾作了全面修订和大量的补充、扩展。修订的多半是我通过长途电话——有时还是国际长途——口述时,因为我的普通话欠标准而导致的对方误听误解误记;补充扩展的是那些因为杂志篇幅

所限而忍痛割舍的部分,新增补的数量相当可观。我相信经过这样系统的修订扩充,我读“天下”无字大书的心得、灵感、体会,将会更饱满、更滋润地呈现在读者们面前。

编辑成书的过程中我没有改动的,是那种口述故事原有的 aroma——这个词是西方葡萄酒评鉴者圈子里常用的一个术语,指天然的、特有的、淡雅且持久的香味。我希望有心人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能够体验出它们内有的、些微的陈年红葡萄酒的气味。

渔父醉,蓑衣舞。醉里却寻归路。轻舟短棹任斜横,醒后不知何处。

渔父醒,春江午。梦断落花飞絮。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

这首苏东坡《渔父》(誉录核对于中华书局 1999 年版《全宋词》)所勾勒的境界,正是我行走于东南西北方之间经年里感觉着越走越近却仿佛永世也达不到的彼岸。

最后我要致谢的,当然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周雁翎博士和姚成龙先生,以及后者的接力人刘军博士。我很幸运,在出版我过去最重要的一本中文著作《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第一版)的前夕,就认识了他们这样极为敬业的文人型出版家和编辑。他们当时就催促我赶快把游学天下的文字整理出书,说你仅仅抽象地宣讲世界一流大学的道理还远远不够,应该佐